



教育片论

[英] 洛克 著 熊春文 译



上海三联书店

教育片论

[英] 洛克 著 熊春文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片论/(英)洛克著;熊春文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2

(思想与社会)

ISBN 978-7-5426-4544-9

I. ①教… II. ①洛…②熊… III. ①儿童教育—品德教育 IV. ①G6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22039 号

教育片论

著
译

者/[英]约翰·洛克
者/熊春文

责任编辑/黄轶

装帧设计/鲁继德

监 制/李 敏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版发行/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2座10楼

网 址/www.sjpc1932.com

邮购电话/24175971

印 刷/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2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640×960 1/16

字 数/260千字

印 张/19

书 号/ISBN 978-7-5426-4544-9/C·505

定 价/40.00元

敬启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66019858

总 序

λόγος和 πόλις是古代希腊人理解人的自然的两个出发点。人要活着,就必须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在共同体中,人不仅能活下来,还能活得好;而在所有共同体中,城邦最重要,因为城邦规定的不是一时的好处,而是人整个生活的好坏;人只有在城邦这个政治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成全人的天性。在这个意义上,人是政治的动物。然而,所有人天性上都想要知道,学习对他们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所以,人要活得好,不仅要过得好,还要看到这种好;人要知道他的生活是不是好的,为什么是好的,要讲出好的道理;于是,政治共同体对人的整个生活的规定,必然指向这种生活方式的根基和目的,要求理解包括人在内的整个自然秩序的本原。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讲理的动物。自从古代希腊以来,人生活的基本共同体经历了从“城邦”(πόλις)到“社会”(societas)与现代“国家”(stato)的不同形式;伴随这种转变,人理解和表达自身生活的理性也先后面对“自然”(φύσις)、“上帝”(deus)与“我思”(cogito)的不同困难。然而,思想与社会,作为人的根本处境的双重规定,始终是人的幸福生活不可逃避的问题。

不过,在希腊人看来,人的这种命运,并非所有人的命运。野蛮人,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说话,讲不出他们生活的道理。政治和理性作为人的处境的双重规定,通过特殊的政治生活与其道理之间的内在关联和微妙张力,恰恰构成了西方传统的根本动力,是西方的历史命运。当西方的历史命运成为现代性的传统,这个共同体为自己生活讲出的道理,逐渐要求越来越多的社会在它的道理面前衡量他们生活的好坏。幻想包容越来越多的社会的思想,注定是越来越少的生活。在将越来越多的生活变

成尾随者时，自身也成了尾随者。西方的现代性传统，在思想和社会上，面临着摧毁自身传统的危险。现代中国在思想和社会上的困境，正是现代性的根本问题。

对于中国人来说，现代性的处境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渗透在我们自己的思想与社会中的这一西方历史命运。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同时担负着西方历史命运的外来危险和自身历史传统的内在困难。一旦我们惧怕正视自己的命运带来的不安，到别人的命运中去寻求安全，或者当我们躲进自己的历史，回避我们的现在要面对的危险，听不见自己传统令人困扰的问题，在我们手中，两个传统就同时荒废了。社会敌视思想，思想藐视社会，好还是不好，成了我们活着无法面对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尾随西方的历史命运，让它成为我们的未来，我们就必须让它成为我们造就自己历史命运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想窒息自身的历史传统，让它只停留在我们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借助另一个传统，思考我们自身的困难，面对我们现在的危机，从而造就中国人的历史命运。

“维天之命，於穆不已。”任何活的思想，都必定是在这个社会的生活之中仍然活着的，仍然说话的传统。《思想与社会》丛书的使命，就是召唤我们的两个传统，让它们重新开口说话，用我们的话来说，面对我们说话，为我们说话。传统是希腊的鬼魂，要靠活的血来喂养，才能说话。否则海伦的美也不过是沉默的幻影。而中国思想的任务，就是用我们的血气，滋养我们的传统，让它们重新讲出我们生活的道理。“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只有日新的传统，才有止于至善的生活。《思想与社会》丛书，是正在形成的现代中国传统的一部分，它要造就活的思想，和活着的中国人一起思考，为什么中国人的生活是好的生活。

目 录

编者导言(John W. & Jean S. Yolton)	1
献词	93
教育片论	97
各节主要内容	280
附录:致爱德华·克拉克的信件	283
译名对照表	286
修订说明	294

编者导言

John W. & Jean S. Yolton

内 容

约翰·洛克,医学博士、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解经家、博物学家、业余科学家,有时还拥有“教育家”这样一个妥当的头衔。他在1693年出版了一部书《关于教育的一些思考》*,但实际上他至少从1684年就开始写作这部关于教育的论著了,那个时候他还身居荷兰(在那里,因他所追随的政治家沙夫茨伯里勋爵遭到叛国罪的控告,洛克聪明地辞去了自己的工作)。正是在荷期间,洛克应他的朋友爱德华·克拉克夫妇之请,为最好地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小儿子而出谋划策。虽然洛克后来同意以某些修改和扩充的形式出版他与克拉克夫妇的通信(这种修改和扩充的工作跨越的年份是1684—1691),但这些信件和这部书并不是,也没有刻意要成为一部关于教育的系统论著或理论。这部著作的题目——《一些思考》(*Some Thoughts*),就提示了洛克对这部著作的态度。洛克的很多著作都采用了类似的谦虚的题目:《关于宽

* 关于本书的书名,我们取《教育片论》为主标题,在导言中,间或用《关于教育的一些思考》表达洛克的谦虚用义。但总体而言,正如 *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的书名一般不译成《关于人类理解的一篇论文》, *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 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 一般不译成《关于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之后果的一些思考》,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一般不译成《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一样,本书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也不译成《关于教育的一些思考》(在这个意义上,《教育漫话》的译名似乎值得斟酌),因此,我们认为译成《教育片论》比较妥当。——中译注

容的一封信》(1689),《关于人类理解的一篇论文》(1690),《关于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之后果的一些思考》(1692)。他的政治著作表现得更为明显:《关于政府的两篇论文》(1690)。

尽管《教育片论》有以上缘起,也尽管洛克对这部书持有如此谦虚的态度,它却在洛克的思想和著作当中占有一个核心的位置。有关知识的起源和增长、意识的发展、性格、德行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形成,诸如此类的主题广布于他的这部著作当中。而《教育片论》与《政府论》之间的关联尤其重要,前者为道德个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训练和教育的方案,后者则将这一个体投入到政治的竞技场。洛克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基本原理在于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其中包括财产权、生命权以及人的个体独立性。洛克在《教育片论》中所颂扬的德行既包括一些个人倾向的品性(如勤劳、谨慎),也包括一些社会美德(如仁慈、慷慨、有礼)。其哲学中的个人主义成分因他的两个观念——人类共同体和市民政治,得到了恰如其分的平衡。个体作为一种道德存在同时隶属于这两个共同体,而这两个共同体则为洛克的道德设立标准,并保存其价值。简言之,洛克的个体是一个社会化的和基督教徒式的个人。由《人类理解论》对人(man)和人格者(person*)之间作出的区别我们可知,《教育片论》给予父母的是关于如何将他们的孩子指导和塑造成道德的、社会的人格主体的一份非常具体的手册。这样来看,洛克的这部关于教育的论著就获得了其所应有的意义和重要地位。

在指出洛克各部著作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强调他关于教育的论著与《政府论》之间的丰富关联的同时,我们应当慎之又慎,不要将过多的系统理论强加在他的论著之上。从他在论著中探讨问题、难题和论题的方法,我们可以发现洛克与同时代人科学态度的相似性。托马斯·斯普拉特(Thomas Sprat)告诉我们,皇家学会(the Royal Society**)

* person 一词在基督教神学中还有“位格”“人身”的意思,这里用的是关文运先生在《人类理解论》中的译名,关于 man 和 person 之间的区别。可见后文对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在后文中,我们依据具体的情境,还把这个词译成“人身”和“人格主体”等。——中译注

** 全名为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for Improving Natural Knowledge,英国皇家学会成立于 1662 年,洛克于 1668 年被选为皇家学会的会员。——中译注

深信,“真正的哲学家必须首先,对个别事物加以细致的、严格的考察。”^[1]斯普拉特警告说,不要依据事物自身将一般理论转变成为未经检验的形而上学体系。斯普拉特(有所保留地)谈及皇家学会的科学家,洛克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自1668年起成为皇家学会的成员,并坚决与其他成员的方法和态度保持一致。这种处理个别事物而非一般理论,从具体的、已知的事实出发的态度,在洛克大部分的著作当中都有所体现。不说《人类理解论》和《政府论》,就是在《教育片论》当中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的大部分著作均是从他的亲身经验当中生发出来的一些疑问、问题或者思考的结果。我们知识的界限是什么?观念如何从心灵中产生?我们如何形成实验科学家探索世界的知识?我们如何陈述事物的本质?我们如何解释对私有财产的获得,以及我们让它受到保护的权力?父母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关系怎样?什么因素将激励人们去追求德行?这些对于洛克来说,是他在各部不同的著作当中经常对自己发问的一些问题,以此为基础,他对相关的一些概念加以细致而又详尽的分析。换言之,他并不是从一种系统的哲学出发,然后将他关于政府、社会或者教育的思想填入到这一框架当中去。

当然,这并不是说洛克没有关于世界和人类的一般信念,也不是说洛克没有影响他阐述其问题领域的一些观点。如果说有一个领域尤其可以明显地见出洛克的信念和观点,那么这个领域就是关于儿童的抚养和教育问题。如果对《教育片论》以及洛克为让儿童获得在世上生活所必须的德行和智慧而提出的儿童工作上的建议,作一个仔细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洛克关于成人和儿童的一套复杂而又详尽的信念。关于儿童工作的这一方面与他在《政府论》当中对市民社会的解释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关联。虽然我们不能过分地在人性哲学(一种系统的理论)和关于人及其本性的一套信念之间作出区分,但这两种方法的结果确实区别很大,比如后者详尽的、描述性的方法与前者更为一般、抽象的思路就正好相反。洛克逼近其大部分问题和疑问的方法更倾向于仔细的观察与描述。

因此,洛克并没有从一种思想体系出发,虽然像所有的思想者一样,他也需要在一定的概念界限内思维。然而,他的分析仍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这个意义上,其整体结构可以看作是包含人的哲学、知识理论以及相互关联的伦理和政治教义的一套体系。我们必须警惕的是依据洛克在某本书中的陈述来对另一本书中的某些段落作出解释,比如说,因为洛克在《人类理解论》或者《政府论》当中持有如此如此的一些观点,那么在《教育片论》当中某些棘手的段落的涵义就一定是如此如此。尼娜·赖克因(Nina Reicyn)正确地指出我们不应把《教育片论》看成“旨在从《教育片论》的哲学中推演其包含的教育法则的有系统的著作”。^[2]赖克因推测说当洛克给爱德华·克拉克写关于教育方面的信件时,“他有意地,在他的哲学和他给自己朋友的建议之间没有作任何联系”^[3]。不管怎样,我们应该记住洛克给克拉克提出建议的背景正是洛克在不断地阅读、摘录以及撰写诸如宗教宽容、家庭的本质、市民社会的形成、语言、思想和实在之间的关系、知识与信仰、医学与一般科学、基督教与圣经等论题的时候。洛克在58岁之前没有出版过任何东西,但在1689—1693年间有五部出版发行的著作出自他手。在他的一系列主要著作横空出世之前,洛克已经有了一些知识和观念上的积累,以供他在著作中采用。因为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教育片论》在洛克其他的出版物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洛克的阅读、写作和思考并不能截然划分开来;他的著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连续性和相关性。

同时,赖克因还正确地提醒我们不要在没有详细的文本支持下给洛克的著作赋予过于细致、具体的联系。思想史中的另一个危险是运用标签作为发现作者意含的手段。在洛克的心理学和教育论著当中,白板(tabula rasa)的概念使得他关于心灵获取观念的能力,以及教师必须发现的儿童脾性的真正意含变得模糊不清。如彼得·盖伊(Peter Gay)所言,一个普通的论断是“洛克是一个经验主义者”,但盖伊像其他的人一样,几乎仅仅止于追问洛克在《人类理解论》当中对知识和意识的解释是否符合这一标签,或者是如何以及以何种方式符合

这一标签的。^[4]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说,但并不总是很容易就能证明,“洛克在《人类理解论》当中表述的哲学浸透在他的教育观念当中,而且我们在分析《教育片论》时必须考虑到这些哲学”。^[5]宣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为现代教育理论奠定了心理学基础”,如盖伊所做的那样,这是一种过誉之词。而在没有证明和具体陈述的前提下说《教育片论》“把他的哲学具体地应用到教育学上来”,这更是过甚之词。当然,盖伊正确地指出洛克并没有孤立地发展他的教育学说,但说他的教育学说发展成为洛克“整个世界观的一部分”,则是大有问题的。^[6]各种体系是从洛克的论著当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控制着洛克的论著。在洛克的著作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太多的关联。同时,从洛克的一部著作到另一部著作我们所能作出的对比和假设则太少了。在考察他的每一部著作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仔细地阅读,牢牢记住著作的整体。

《教育片论》成书的动力来自洛克的好友爱德华·克拉克及其夫人的要求,他们要洛克提供一些抚养孩子方面的建议。向洛克征求这类建议的还不止克拉克夫妇。洛克的另一个好友威廉·默林纽克斯(William Molyneux)得知洛克的教育著述时,就向他索读。默林纽克斯的兄弟托马斯则在荷兰与洛克交谈时就已经得知了洛克在教育方面的著述。^[7]威廉·默林纽克斯期望获得教育他的儿子的一种方法。在另一封信当中,默林纽克斯详细地描述了因依照洛克的方法,他五岁的儿子所取得的进步。^[8]在后来的一封信中,他还谈到“您的教育方法对我的小儿子产生了超常的影响”,在1695年的另一封信中,默林纽克斯描述了他的儿子在洛克建议的影响下学习的一些科目。^[9]在给克拉克的“献词”当中,洛克还告诉我们说,伴随着《教育片论》的出版,“近来我自己还常被很多人问起,说他们不知道如何养育他们的孩子”。^[10]

洛克与儿童

为什么那些已婚的人们却向一位单身汉讨教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方

法？虽然在其《人类理解论》当中洛克在婴儿和儿童方面着墨很多（以此为遗传心理学奠定了初步基础），在《政府论》当中洛克也对父母和儿童进行了一些讨论，但就洛克 1693 年之前发表的东西而言，还看不出他在儿童及他们的教养和教育方面特别的博学。这一问题——什么使得父母在这些领域向洛克征求意见——在过去就有人提出来了。埃文·丹尼尔牧师（Revd. Evan Daniel）在他修订的颇受欢迎的 1880 年版的《教育片论》中，加入了一个详尽的导言和一些注脚，他引用哈勒姆对洛克《教育片论》和卢梭《爱弥儿》的评论，“如果说它们都存在着同样的缺憾，因为它们的作者都缺乏对儿童的详细观察，那么有一点确定的是，洛克因为他的谨慎和合理的判断而更好地避免了一些错误。”^[11] 丹尼尔先生没有对这一观点再加评论，显然是表示赞同。但是合理的判断似乎不能作为教育儿童的一个充分基础，至少，合理的判断不能孤立于与之有密切联系的，对儿童以及对他们的本性、他们的动机、他们的欲求的理解。在洛克的《教育片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儿童行为的详尽描述，这足以暗示洛克对儿童不是一般的了解。事实上，洛克对儿童非常痴迷，并深受儿童的喜爱。他在通信中经常谈到他朋友的孩子们。

安妮·格里格（Anne Grigg）女士在 1676 年给洛克的通信中谈到她的儿子——诚实的威尔（Honest Will）——时写道，他“在布里斯托尔（Bristol）[即指在家里]可以很好地成长”，这意味着她决定“让他一直呆在家里，直到他适应了寄宿学校的种种艰辛”。威尔经常提到洛克，并把洛克当作“他的朋友”。^[12] 另一位朋友，大卫·托马斯（David Thomas）博士，在 1677 年给洛克的一封信的末尾加了一个注释说，“你的教子[他们的儿子约翰]很好。”^[13] 丹尼斯·格伦维尔（Denis Grenville）博士则告诉洛克说，他的姐姐“永远不会忘记你在去年冬天对她本人以及她棘手的孩子的特别关照”。^[14] 这个小孩，“我们的小宝贝”，向洛克为她所做的而致以谢意，虽然她的父亲有些怀疑她的诚意。在 1680 年的一封信当中，安东尼·阿什利·库珀感谢洛克“给予我的孙子的关怀”，未来的伯爵三世，那时才九岁。^[15] 詹姆斯·蒂勒尔（James Tyrrell）感谢洛克“教给小杰米（Jemmy）的一些文法，以及你

给我关于他的学业的教育方法”^[16]，这个小孩那时六岁。另外还有一个朋友，托马斯·斯特林格(Thomas Stringer)，告诉洛克“我的小子[那时五岁]说他非常愿意聆听你的指导”。^[17]

洛克的通信集中的这些例子在《教育片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炼，其中谈到了很多场合洛克通过儿童以及父母对他们的态度观察了一些具体行为。第18节就谈到有一次洛克“住在一户人家里，(那家的人)为了安抚一个顽固的小孩，就每逢他哭便给他喝东西；这样小孩便不断地喝，那时他还甚至不会说话，但他在24小时之内喝下的东西比我还多”。这里可能指的是洛克在阿姆斯特丹住在本杰明·福利(Benjamin Furly)家里时的情形，洛克在他家里住了两年(1687—1689年)，期间他与克拉克通过信。福利夫妇有五个孩子，最年幼的一个——阿伦特(Arent)——跟洛克特别亲密。阿伦特那时只有两岁。^[18]住在各个家庭当中有利于洛克在自然的环境下观察儿童。在《教育片论》的另一段落当中，他评论到“很多人教养他们的幼童的一个重大错误……在于幼童心灵没有习于遵守纪律，服从理性”，这是洛克最爱谈论的一个主题(§34)。在另外一个段落当中，他说道：“我看到过饭桌上的一些孩子，桌子上应有尽有，但他从来不要求任何东西，只是乐于接受别人给他的东西；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我还看到一些小孩哭着要他们所见到的所有东西，每一道菜他们都要，并且要第一个吃。”(§39)还有，“我所认识的一位谨慎而又仁慈的母亲”有一次通过鞭打——而不是采用洛克所倾向主张的约束儿童的方法(但在某些时候洛克认为鞭打是必要的)，来对付(她女儿的)顽梗(§78)。在“儿童自我意志和喜好支配”这一主题上，洛克以一种对儿童非常熟悉的清晰语调评论说，“我们看到儿童(几乎自他出生以来，我敢肯定时间远在他学会说话之前)啼哭、耍脾气、使性子、闹别扭，不为别的，只是要伸张自己的意志罢了。”(§104)他继续评论儿童对支配的喜好和他们的自我意志：

凡是没有觉察到幼童身上很早即有的这两种性情的人，便可

以说他几乎没有去注意幼童的行为。这两种性情几乎是一切扰乱人类生活的不公正和争斗的根源,凡是认为它们不必及早地加以根除,并导之以相反的习惯的人,便是忽略了为一个善良的、有价值的人奠定基础的合适时机。(§ 105)

在这一最后的评论当中,我们听到的是洛克的一个基本主题:童年是对人进行培养的基础。对他所熟识的儿童另外一种观察,使得洛克能够对儿童的啼哭和尖叫等行为进行详尽的刻画,他区分出两种类型的啼哭:“要么是**顽梗的、专横的**;要么是**不满的、抱怨的**。” (§ 111, 以及 § 112—114) 只有那些能经常见着在这些章节中所描述行为的人,才能对这些行为作出这样的分析。同样的,如洛克所言,“我经常观察到幼童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当他们得到什么可怜的小动物,他们都倾向于去虐待它们”,对儿童对待这些小动物的方式以及使得他们如此残忍的动机(对此洛克非常惋惜),洛克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 116)。他还指出并且不赞成儿童对佣人的态度:“在一些绅士的家里,我们不难见着他们的幼童常常以盛气凌人的口吻、轻蔑的称呼以及傲慢的举止对待家里的佣人;好像别人来自另一个种族,是低于他们的一个族类。” (§ 117)

早期的教育论著

正是在家庭中有关儿童抚养的这些以及其他的一些主题的细节所形成的财富,证实了洛克对他的朋友的孩子所作的第一手的观察。这种对具体行为的关注使得洛克的教育论述与他同时代的其他大部分论述区别开来。但在论述儿童的教育,尤其是绅士家庭的儿童教育时,洛克并没有发明一种新的课题材料。早自 16 世纪开始,就有很多论文自称是研究教育的。洛克《教育片论》当中的很多论题,我们在那些早期的教育论文当中都能见着。

其中有一部早期的著作,在教育史中常被谈及,即是托马斯·埃利奥特*的《治人者》(*The Boke Named the Governor*, 1531),专门为那些即将从政的绅士之子而作,并在公共福利研究方面享有权威。当中讨论的主题有家庭教师或导师的选择、儿童的抚养、要教授的具体科目以及这些科目的秩序等。对于洛克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主题在这里也能见着:绅士所应具备的德行,如公正、刚毅、耐心。罗杰·阿斯坎(Roger Ascham)的《论教师》(*The Scholemaster*, 1570)主要致力于拉丁文的教授(这也是洛克关心的一个题目),但它的副标题称为“绅士与贵族家庭青年的私人教养”。在阿斯坎的前言中,他提出了关于儿童的约束和惩罚的问题,这又是洛克非常关注的一个主题。阿斯坎称,有些人相信过多的鞭打(beatings)会导致儿童厌学。阿斯坎著作的整个第一部分涉及的是激励儿童学习的方法,虽然谈及的是拉丁语的学习,但可以推广到所有的学习中去。阿斯坎所体现的对于儿童的真切关注,其态度是洛克所共享的。

亨利·皮查姆(Henry Peacham)所著《完整的绅士》(*The Compleat Gentleman*, 1622)是另一个为绅士出谋划策的例子。当中具体的章节涉及父母对儿童教育的责任。皮查姆说,学习是贵族气质的主要成分,它能够让王公更好地实施统治。发现儿童各有不同的本性(这一点也为洛克所强调)之后,皮查姆督促家庭教师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对每一个儿童)要采用独一无二的方法,而不要采用千篇一律的方法”(p. 22)。他还反对残酷、严厉地对待学生:“不含教育的纠正是平庸的虐政”(p. 23)。“在导师与学生之间应该有一种良性循环和情感上的互动”(p. 24)。他批评那些对学生缺乏同情态度的导师和父母,表扬了在低地国家(Low Countries)**所采用的方法。在那些国家,与正式的教学相得益彰的是非正式的散步和交谈。

* 托马斯·埃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年),英国著名学者,提倡用英文取代拉丁文写作,除《治人者》这部著名的教育论著之外,他还编撰过第一部拉英词典。——中译注

** 低地国家,指现在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中译注